

目 录

枣阳简介.....	赵天佑 (1)
辛亥武昌首义后光复枣阳经过.....	马永谦 (4)
马伯援追随孙中山先生记略.....	胡安立 (10)
王安澜与大阜山起义.....	马永谦 (16)
深受农民欢迎的白朗起义军.....	余 辉 (23)
高仲和传略.....	高映轸 (26)
马伯援传略.....	王治碧 (33)
日寇三次侵犯枣阳记略.....	胡安立 (36)
抗战时期的枣阳文化工作站	赵文灿 赵万爽 (40)
枣阳抗战纪事.....	王治碧 杨正凯 (43)
在日军铁蹄第一次践踏乡土的时候	陈任远 (47)
在党的“团结抗日”旗帜下, 枣阳军民 奋起抗日.....	胡安立 (51)
山主马瑞堂在抗战中的二、三事.....	杜 超 (65)
日寇侵枣罪行点滴.....	余 辉 (68)
蒋介石来枣阳.....	赵万爽 (71)
罗启疆在枣阳.....	肖儒祥 (75)
杨秀阡烈士传略.....	王治碧 杨正凯 (79)

红四方面军在枣阳的两次战斗·····	马永谦 (84)
走上弃暗投明道路的前前后后·····	<u>王明谟</u> (89)
对枣阳农民培训班片断的回忆 ·····	马恕安口述 黄诚恕整理 (93)
有关国民党时期《枣阳日报》的回顾 ·····	尹保祥 (95)
枣阳文化撷英·····	丁 松 (98)
曲剧在枣阳的兴起·····	赵文灿 (105)
汉剧在枣阳·····	胡 波 (109)
<u>枣阳县医务工作者联合会之始末</u> ·····	李贵章 (112)
我家从医史散记·····	陈光武 (116)
庆远长药店兴衰记 ·····	赵立长口述 程相文整理 (119)
建国前我市工商业概况·····	杜 超 (125)
红军攻打吴家冲·····	丁 松 (128)
国民党时期枣阳民团和团防局罪行录 ·····	胡安立 (131)
建国前枣阳各地的庙会·····	胡 波 (134)
<u>天主教在我市的传播</u> ·····	程相文 (137)
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目 ·····	政协枣阳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(140)
编 后·····	政协枣阳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(142)

枣 阳 简 介

赵 天 佑

枣阳市地处鄂西北边境，东抵随州，西接襄阳，南连宜城、钟祥，北与河南省桐柏、唐河县接壤，西北与河南省新野为邻。汉丹铁路和汉襄公路东西横贯全市，枣阳市政府所在地枣阳城，西距襄樊市74公里，东至武汉市272公里。沙河穿城而过，将城区分为三块，即南部的工业区、北部的商业区和东部的行政文化区。全市辖区坐标是东经112°30′至113°北纬31°40′至32°20′，南北长78公里，东西宽53公里，总版土3277平方公里。全市地势东南高，西北低，境内山岭起伏，河流交错，田野广阔。基本上是“三山一水六分田”。全市现辖新市、鹿头、姚岗、太平、杨垱、姚岗、七方、琚湾、熊集、梁集、耿集、平林、清潭、吴店、王城、资山、兴隆、刘升等18个镇；钱岗、吉河、徐寨、蔡阳等4个乡；车河、随阳两个国营农场；北城、南城、环城三个办事处。居住的有汉、回、土家、朝鲜、黎、满、壮、高山、蒙、彝、侗十一个民族，近90万人。

枣阳历史悠久。周时属唐国，楚灭唐后属楚国。秦置蔡阳县，属南阳郡。西汉划白水（今吴店镇）、上唐（今随州市唐县镇）两乡置春陵侯国（古城址在吴店镇、春陵村），与蔡阳县同属荆州南阳郡。东汉改春陵乡为章陵县，后分蔡

阳县的东北地带置襄乡县，今市境当时为三县分治。汉献帝升章陵为郡，辖蔡阳、襄乡两县。三国时降章陵郡为安昌县，西晋初撤销襄乡县并入蔡阳县。南朝宋时复设襄乡县，齐时又升蔡阳为郡，辖东蔡阳、西蔡阳等县。北魏改襄乡县为广昌县，分安昌地域增设丰良县，合并东西蔡阳县（为蔡阳县）。西魏分蔡阳地置双泉县。隋改广昌县为枣阳县。又分丰良地置清潭县后，废丰良县并入春陵县。唐初将蔡阳县并入枣阳县。后又将清潭春陵两县并入枣阳县唐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，分枣阳县地置唐城县（今随州市唐县镇），至此，本市疆域基本定形。宋升枣阳县为军，元降枣阳军为县，属南阳府，后改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襄阳路，枣阳隶属襄阳始于此。明属湖广布政司襄阳府，清属湖北布政司襄阳府，民国初属湖北省襄阳道。抗战胜利时属湖北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。1947年12月枣阳解放，县境方以襄花公路为界，路北置枣阳县，路南置襄枣宜县和随枣县。1949年5月，撤销襄枣宜县和随枣县，将两县所辖原枣阳地区合并为枣南县（治在熊家集）。同时，划清潭、平林入洪山县。同年8月，撤枣南县并入枣阳县，属襄阳地区行政公署。1955年7月，撤销洪山县，清潭、平林复归枣阳。自1983年10月，改属襄樊市管辖。1988年元月国务院批准撤枣阳县建枣阳市。

枣阳是鄂北的咽喉，襄樊的门户，地杰人灵，人才辈出，更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。西汉末，枣阳人刘秀起兵反莽，建立东汉。宋时，孟宗政、孟洪父子率兵抗击金兵。清朝末年，马伯援、谢楚珩、高仲和、王安澜等革命志士在武昌首义。1925年，程克绳在程坡建立枣阳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，是鄂北最早的党组织。抗日战争中，日军三次陷枣，县

境内始终没出现伪组织和汉奸。1947年，枣阳人民以实际行动迎来了解放。

枣阳是文明古地，又是汉光武帝的故里，故名胜古迹极多。境内有古遗址128处，古墓葬96处，古建筑32处，革命纪念旧址20多处。主要有：

皇村，在吴店镇东五里，为光武帝故宅基址，村后小山拥抱，村前白水（滚河）环绕，景色秀丽。

白水寺，坐落在吴店镇西南的狮子山上，始建无考，古书上记载说，“乡人祀汉光武，明宣德中，僧真隆改以正殿供佛，以西偏三檩祀汉光武，旁列云台诸将木主”。清嘉庆年间和民国三十年曾两次重修。该寺庙堂古朴，依山旁水，树木葱茏，环境幽静，历代名人多来此游览赋诗。李白《游南阳白水登石墩作》即是其中的名篇。

无量台，又名飞云台。在吴店镇北二郎，传说是光武中兴的点将台。明代建，以砖石砌成，不用寸木，筒瓦盖顶，飞檐斗拱，内祀汉武帝。

八万山，在平林镇东南，相传光武帝曾屯兵八万于此。

报恩寺，位于县城书院衙县政府院内，砖木结构，始建年代不详。相传刘秀起兵反莽，兵败至枣阳城，莽兵紧追，刘秀见太和寺窗门大开，即越窗入寺，随之一蜘蛛在窗上结网，莽军追至，见门落锁，窗结网，以为刘秀不在此而离去。刘秀当了皇帝后遂把太和寺改名为报恩寺。

黉学，又名孔庙学宫。位于北城大南街粮食局院内，有大成殿崇圣祠、大成门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明伦堂、忠义祠、节孝祠组成，现存的大成殿建成于1269年，朱户飞檐，绿釉筒瓦，颇为壮观。

辛亥武昌首义后光复枣阳经过

马永谦

辛亥革命前，枣阳隶属安襄郢荆兵备道襄阳府，县知事程长龄（江苏人）于宣统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任职；驻枣清军有湖北新军第八镇马队八标三营的一个排（营部设在襄阳），排长周鸣岐，率三十余骑，驻县城北关黄龙岗陕西会馆；另有从襄阳派来的巡防马队（又名辑私队），负责保护官盐，禁止贩运私盐，有六十余骑，哨官周郅戡驻县城小东门报恩寺。

清末，枣阳江湖会（红帮）组织盛行，遍及城关、吴店、琚湾、鹿头等较大集镇。该组织由外地传来，以“兴汉灭满”为宗旨，故其活动绝对秘密。他们常在鹿头镇张万兴（红帮大爷），城关黄玉山（红帮么爷）家聚会，外与武汉江湖会头目马瑞堂（枣阳人）、胡吉安取得联系，内与驻枣清军中的江湖会党人周鸣岐等时有来往，从而形成了一股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潜在社会力量（辛亥革命后，江湖会组织逐渐蜕变）。

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（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），武昌起义爆发。消息传到枣阳以后，驻枣清军虽屡接安襄郢荆兵备道喜源（满人，驻襄阳）加强防范的命令，但军心动摇，民心思变，清王朝覆灭已成大势所趋，

吴店民众率先兴兵起义始末

一九一一年十月下旬，吴店原在湖北新军骑兵营当过哨官的陈绍森，由武汉回家（其家在吴店经商，兼种田地）。因他在军队中加入过江湖会组织。到家后即与吴店江湖会同党刘宝庭（开染坊）取上联系，介绍武昌起义经过和战斗情况。同时商议以红帮号召，在吴店东门外刘家祠堂秘密招兵起事。吴店西街黄崇兴（号龙轩）自幼习武，人称“教师头”，其父摆杂货摊，并有田地十二亩，店房一座，家中以防匪盗为名，经常架有土炮两尊（当时吴店一带土炮——即生铁炮较多）。他积极响应起义，与陈绍森共同主持招兵事宜。吴店青壮年居民踊跃报名参加。没几天，即招募新兵五六十人，暂编为两个队：一队由陈绍森率领，驻东门山陕会馆；一队由黄崇兴率领，驻西街他自己家中。所招新兵，每天在山陕会馆练操、习武。没有枪炮，就以刀矛作武器。招兵用费，由黄崇兴出面向商户劝募。

吴店东街大地主刘锡侯，见陈绍森等招兵“谋反”，即串动绅商罗义兴、罗义顺、张隆兴及天主堂神父，联名密告，状呈枣阳县和襄阳兵备道，请求急速派兵镇压。而陈绍森所招新兵大多吃过县捕房班头王崇德（外号王拐个子）的苦头，报仇心切。一次，王拐个子派两名差役到吴店传案，被新兵发现，当即聚众将两差役痛打一顿。十一月中旬，县衙即派王拐个子带三十余名差丁，到吴店镇压民众起义。他们到吴店后，径直包围山陕会馆。王拐个子带有快枪一支（当时称“无烟钢枪”），其他差人均拿土枪或刀矛。由于突然袭击，陈绍森毫无准备，加上所招新兵没有战斗经验，

临阵慌乱。在敌人围攻中，陈绍森指挥战士上屋顶用砖瓦抗敌，并作突围准备。不幸褚××（河南人，织布匠）被王拐个子的快枪击中牺牲；接着，刁光荣、杨吉升亦被快枪击伤，陈定炳的臀部被矛尖刺伤。这时，西街黄崇兴所部，闻差人带有快枪，便四处逃散。在此情况下，陈绍森为保存兄弟，即喝令将大门打开，让差人入内。他头戴金边帽，身穿旧日的军官服，挂上东洋刀。昂首挺立，毫不畏惧，声言：“此事全由我一人承担，与众无关”。当即被捕解往县衙。知县瞿长龄坐堂亲审，令其跪下，他破口骂道：“我五品军功，你七品县令，我比你大两级，难道还向你狗官下跪？！”瞿长龄恼羞成怒，处陈绍森以死刑，把他架上站笼，困乏至死（尸棺暂厝北关外）。

次日，驻黄龙岗陕西馆的新军马队周鸣岐曾带人到县衙保释陈绍森，但为时已晚。

同年十一月中旬，襄阳兵备道喜源获报吴店陈绍森“谋反”，即令驻襄巡防营统领刘温玉派巡防五营右哨八十多人到枣镇压，由哨官廖福臣，副哨官荣光耀带领赶赴枣阳。得知“叛乱”已告平息，他们便屯兵枣阳，后由副哨官荣光耀带四十余人分驻吴店。

驻枣清军和琚湾民众起义

吴店起义受挫不久，湖北新四军第八镇马队八标三营由襄阳派驻老河口的二十多名骑兵，在李秀昂（枣阳人，加入过江湖会）、张国荃领导下，串动驻老河口的巡防营和当地居民中的江湖会党人，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（旧历十月初八）响应武昌起义，光复老河口，逮捕和处决了老河

口清军统带周祥谦，组成了两千多人的起义军。继而于十一月三十日，分水陆两路光复枣阳。这时，驻扎枣阳的湖北新军马队周鸣歧，原与驻老河口马队同属一营，素有密切联系，他见李秀昂、张国荃率兵起义，随即在枣阳积极串动各方面力量响应起义。先后串通驻吴店的襄阳巡防五营右哨副哨官荣光耀所部四十多人（驻县城的哨官廖福臣当襄阳光复后，即带四十余人回襄）；驻县城报恩寺的巡防马队哨官周郅戡所部七十余人；琚湾江湖会党人琚体康所部民众武装五五十余人，并密约起义时间。

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（旧历十月二十一）凌晨，琚体康带五十余人，以刀矛、土枪为武器，赶到枣阳，与此同时，副哨官荣光耀带巡防五营士兵四十余人亦由吴店赶到。他们立即涌进县衙。把知县瞿长龄逮捕，押解襄阳，缴获了县衙捕房枪支；逮捕了民众痛恨的班头王拐个子，就地处决。驻在城内的湖北新军马队周鸣歧和巡防马队周郅戡等，一面邀集绅商和各界民众开会宣布保商保民平买平卖等以安定民心；一面通告全城遍挂白旗，欢迎起义军。接着，起义军派人到襄阳报告光复枣阳情况。襄阳新成立的安襄郧荆总司令部旋即任命周鸣歧为枣阳安抚员（不久，调回襄阳），周郅戡、罗超群为驻枣起义军管带；派遣标统任宏均驻枣督办粮饷。

北伐招讨先锋队抵枣安民

武汉首义后，驻汉枣阳籍革命党人陈重民、耿毓英、王安澜、马伯援、谢超武、谢经德、童绍基、高仲和等，鉴于清军仍在向汉口、汉阳反扑，为了牵制敌军，极力倡议北

伐，请湖北都督府分兵以进取鄂北，后都督府任命李雨霖为安襄郢荆招讨使，高仲和等随同协助。北伐招讨军由汉进抵沙洋后，添设北伐招讨军务处，部队扩大到五百余人，以高仲和为军前头等参赞，全权主持北征事宜。这时因战略需要，决定兵分两路：季便率主力往西，暂到荆州一带活动；高仲和率先锋队一百五六十人，继续北征。先锋队自沙洋经安陆（现钟祥）、宜城，于十二月二十八日（旧历十一月初九）抵达襄阳。时襄阳已为张国荃占据（张事前未与招讨使取得联系）北伐招讨先锋队暂驻樊城，恰值驻广水之湖广总督段芝贵率部分清军西犯，由随州进入枣境。枣阳民众乃派人到樊城，请先锋队进兵。高遂率部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十日（旧历十一月二十二）午夜出发，天明抵枣境，上午进城。清军闻枣阳增加兵力，原张国荃派来的守军亦有准备，未敢接战，迅速后撤。先锋队跟踪追击，追至随阳店，见敌军远逃，复返县城，驻扎文昌宫。从此，清军不敢再犯，枣阳民众终于摆脱了数千年的专制帝王统治。

先锋队驻枣期间，为减轻民众负担，首先将张国荃派来之催粮逼款人员全部驱赶出境。继而整编驻枣军队，原张国荃在枣阳建制炮兵一团（团长罗超群，由管带升任）和骑兵一营（营长周郅戡）。但均徒有虚名，并无实力。炮兵团不过二三百人，只拥有旧式土炮数尊；骑军营更不足百人。高仲和即将此两部建制概行取消，加以改编，资遣部分不可靠的官兵回乡，其余的合为一营。因周郅戡、罗超群已自行离队，即以施宣武为营长，重予整训，部队面貌为之一新。

当时枣阳社会秩序紊乱，匪霸横行。城内恶棍陈远山，投靠天主堂，依靠洋人势力，称霸乡里，民众恨之入骨。

革命军至，群众纷纷控告，先锋队即将陈远山捕获查办。意大利教堂神父闻讯赶来，要求保释，并大肆咆哮，气势凶凶。高仲和见神父无理纠缠，仗势压人，便喝令“送客”！神父大怒，掷茶杯于地，连声威胁说：“你要小心点！”悻悻而去。从而更激起先锋队全体官兵义愤，立即布告陈远山罪状，就地正法，人心大快。意大利神父气急败坏，致电罗马天主教皇，控以仇教诬杀并诬民众为匪。教皇据电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交涉，孙转批湖北都督府黎元洪，黎又批交安襄郢荆招讨使季雨霖处理。当时众人皆以为酿成教案，恐难收场，无不为此担心。但高仲和将陈远山所犯强奸、抢劫等重大罪行二十余宗，备文分别呈复招讨使署。湖北都督府及南京临时政府，后终无事。自此，枣阳匪霸有所收敛，社会秩序渐趋安定。

马伯援追随孙中山先生记略

胡安立

马伯援(1884—1939)枣阳县鹿头镇人。幼时读书乡塾，聪明好学。一九〇五年(清光绪三十一年)留学日本，一九一〇年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。即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，为早期的同盟会员。

辛亥武昌起义，马由上海率红十字会成员，暗自护送黄兴(即黄克强，因被清政府通缉，化装成医生)，宋教仁(即宋遁初)到武昌，并参加汉阳战役。

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马为湖北全权代表，在南京投票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内阁组成，马被任命为内务部会计主任兼马警总队队长和总统府秘书等职。从此马常任职于中山先生左右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尽心为革命效劳。内务部工作开始时，分文没有，所领财政部的票子，市面拒绝使用，后由广东运来现洋到南京，分给内务部两千块银元，马立即和居正部长带着马车到总统府领款，中山先生见了笑着说：“两千银元有相当的重量，看你们两个，一是部长，一是主任，如何搬上车，”当时他两人高兴地回答道：“我们是革命党，说什么部长不部长、主任不主任，用一根棍子就能抬上车。”当时李相府一套房子交给内务部使用，决定由庶务龙某负责修缮，竣工后，龙某要索款四

千余元（银元），马为会计主任。亲往察看，仅见屋内刷了两桶石灰水，就如此高价？当面请来工人核价，实化费二百银元。使其贪污未能得逞。国民政府成立之初，南京社会秩序混乱，马白天工作，夜晚率领马队巡逻街道，不几天，社会治安明显好转，受到全城商民的好评。

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南北议和告成，袁世凯篡权，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，马亦辞去工作职，并先行回武昌，和田桐、章士严等，筹备欢迎中山先生卸任后到武昌。不久，马又在鄂驻节抚台衙门（后为党史馆）欢迎中山先生到来，并拍有合影照片。

一九一三年（民国二年）二月五日，马追随孙中山先生到达上海。适逢日本山田纯三郎，代表日本实业界邀请中山先生到日本参观访问。于是，马即随中山先生，于二月十一日乘山城丸轮船东渡日本。船行至吴淞口时，在吸烟室，中山先生向马伯援询问湖北现状后，问：“湖北党人何故攻击黄克强？”马如实汇报说：“汉阳失守，湖北同志知黎元洪必走，大家苦劝克强留鄂坐镇，克强不允，亲言到广东搬兵，行抵上海；不复南下，乃克强大不利于湖北党人之口实也。”

中山先生到达东京，有数千人列队欢迎。连续几日，日本各界举行的大小欢迎会有十多次。在各处欢迎会上，马或为主席、或为来宾，跟随中山先生到会。二月二十日，中华留日学生数千人集会，欢迎中山先生。会上中山先生演讲一个半小时之久，大意是：中国学生数千，在东京留学是一件可喜的事。因为中国在改造中，须得有真实学问的人去从事建设，但学问宜为社会服务，为社会出力，始可达到人类

同胞，世界和平的目的。指出：须联络日本学生，研究中日两国互助方案，再协助各弱小国家脱离管辖，完全独立，东亚和平，世界和平，方有希望。当时鼓掌之声震动屋瓦。

三月四日下午七时，中山先生于帝国旅馆宴请日本各界代表，席间，中山先生演说中日和睦，感谢日本友人援助中国革命。日本代表浦奎吾说：“中日唇齿相依，文化同源，当然是本着孙先生的主张，亲睦互助，共同努力。”詎料中山先生这些演讲，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。袁大生疑心，一是怕中山先生联络日本与他不利，二是因自己派人暗杀了宋教仁，做贼心虚。所以即派亲信孙宝琦、李盛铎为特使，到日本刺探消息，以便防患未然。孙、李到东京后，七月六日，神户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（以下简称“青年会”）开欢迎会，马亦被邀参加。会上孙宝琦等演讲毕。马即登台演讲，痛斥孙宝琦道：“中山先生说：‘知行合一’，你为何在山东独立时，一会悬挂龙旗，一会取消龙旗，于一日之内达三十六次之多？你钻狗洞，拜干爹，以妻妾幸权贵。‘知行合一者，固如是乎？’”到会的学生无不鼓掌欢迎！但是，孙宝琦的脸厚，尚不以为耻。”

一九一四年（民国三年）初，马向中山先生进言道：辛亥革命之后，国民党受到官僚们的腐蚀和摧残，本是革命失败的总原因。但是，党内有许多人利用土匪，争权夺利，结党营私，忘掉了革命的动机与目的，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。五月二十五日，马在东京晋谒中山先生后，又访黄克强、居觉生、肖纫秋（均县人）、丁景良（郧阳人）等，获悉“中华革命党将产生”。中山先生主张，凡欲革命者，须再入党，并亲自签名，以示服从。

一九一六年（民国五年），马回家乡（鹿头）过春节，农村习俗，家家户户写对联和“捷报条”，地方上拍马屁者，大书特书“中华帝国洪宪元年”，而马的“捷报条”仍是“中华民国五年”。是年六月六日，袁世凯死后，黎元洪继任。不久，鄂北党人丁景良、肖纫秋由中山先生身边回鄂北家乡。因丁、肖两先生素以马志同道合，来往密切，特先函约定于九月二十六日在枣阳县城会晤，久别重逢，相聚两日，丁景良传达了中山先生主张：“现在国人厌乱，甘心调协，希望小康，吾辈党人明知其不能苟全，但在此情况下，只得以退为进，暂时屈服，在此过程中，吾辈须努力工作，联合同志，唤醒民众，由农村着手”。这次丁、肖两先生，已筹资金五万元，拟在老河口办一转运公司，运销土特产，安插同志。同时，劝马伯援在鹿头家乡办职业教育，希望其努力实现计划。不料此事过后，谣言四起，说中山先生特派丁景良、肖喜（即纫秋）两人到鄂北，策动暴动，尤以天主堂的传教士宣传为最甚。

一九一七年（民国六年）七月一日，马伯援由北京返乡，协同中山先生派的代表朱子英等，同车赴鄂北。朱子英到襄阳的目的，是运动黎天才（襄郢镇守使）加入驱王（王占元）之役。因此，于十二月在襄阳宣布自主，竖起了独立旗帜，史称“荆襄自主”，准备进军武汉，后计划破产。

一九一九年（民国八年）十一月十九日，马赴杭州参加基督教青年集会，听沈文卿牧师报告说：冯玉祥的军队爱国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十二月三日，马由杭州到上海，在建设杂志社会见胡汉民，谈到冯玉祥的军队，如何知理、爱国等等，並说准备有机会去看看，运动他革命。胡汉民非常赞

成。并说：你们是同道（冯也是福音教），你能劝他革命，最好不过。

一九二二年（民国十一年）初，马伯援受中山先生之命，到西北军作革命宣传工作，运动冯玉祥革命。三月十八日，马到西安，皆同张亚雄以传教为名，密会冯玉祥。四月十四日。又同张亚雄到三元里会见了胡景翼，晤谈中，马问：“胡公对孙中山的态度究竟如何？”胡提笔书写了八个字“人远心近，始终一致”。关于运动冯玉祥，胡景翼在北方革命之事。马曾数次谒见中山先生于上海莫利爱路。后在河南洛阳，马又会晤了冯玉祥，谈北伐问题。

一九二三年（民国十二年）十月二十五日，马在广州大元帅府，谒见中山先生，谈到冯玉祥的事。中山先生说：“冯玉祥若真革命必须加入国民党，”马说：“入党固可表明其决心，但因入党问题。而妨害革命进行，亦可不必。”

一九二四年（民国十三年）四月，冯玉祥组织国民军，发动了北京政变，赶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。当时，冯一面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，一面又派马伯援（是冯的顾问）代表冯玉祥、胡景翼和国民军赴广东欢迎中山先生。十一月十七日，中山先生乘日本春阳丸号轮船到上海吴淞口登岸，住法租界44号休息午餐。在此，马又向中山先生汇报了冯玉祥的情况。中山先生说：“冯玉祥革命彻底否？”马问：“何为彻底革命？”中山先生说：“一、对外主张收回主权；二、对内主张和平统一。实行民主权”。马说：“冯对于以上两种主张，不但赞成，且已实行”。中山先生在吴淞口作短暂停留后，又转乘一轮船，绕道神户，再赴天津。当时的情况是，英国事事掣肘，所以中山先生不乘英轮。而乘日轮绕道

北上。十二月四日，中山先生到达天津时，天气虽然很冷，欢迎者沿途塞满。当晚北方民众约定在民众饭店，开欢迎宴会。请中山先生发表政见。但是，由于军阀恶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所敬。英国领事硬说当日欢迎孙总理登岸，有赤旗团体参加，并说孙总理北上，确系宣传共产等等。总领事禁止当晚集会。在中国领土内，不准中国的领袖向民众讲话，这是一件痛心的事，因此，中山先生气得卧床不起，所以未去参加欢迎宴会。

中山先生到天津（住张园）后，马问冯玉祥：“中山先生住天津好，到北京好？”冯说：“来北京为上策，因天津地方，官僚政客，咸集该处，是非较多”。马又问：“冯总司令与中山先生相见的地方在何处为宜？”冯说：“在北京。万不可来西山（慈善寺是冯的住地）惹人注目”最后，冯还说：“外面说我消极，革命的事怎可消极，军事方面仍负责进行，请语中山先生放心。”十二月二十日，马在天津谒中山先生，报告冯的性情等情况。中山先生于病床上答：“知之矣！”并嘱马伯援：要去日本，注意与日外交。

此次，马伯援欢迎中山先生北上，上海基督教总会领导人，数次催促马返东京经营会务（因马是“青年会”干事），勿参与政治。马当即付之一信，写道“伯援代表冯总司令欢迎中山先生北上，促成和平统一大局，乃吾人千载一时的工作，我个人认为必要，并非以“青年会为牺牲品。伯援是革命党人，辛亥之役，亲身参加，奉直大战，曾代表冯氏赴粤，既非借此猎官，尤非借“青年会”名义去招摇撞骗……伯援个人行动之自由，无论何人不得干涉”。